

高墙内的“守护者” ——区看守所监管民警的故事

□记者 康新欣 通讯员 徐华超

看守所,一个听起来熟知却又陌生的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接触,仅仅是电视或书里的一种存在。它高墙铁网、戒备森严;它深沉神秘、是邪恶与正义共存之地。在这里,各类民警被赋予了一个人们嘴里常说的却又陌生的统称:“监管民警”,世人只知道他们成天在看守所与在押人员打交道,却不知真正的工作状态。日前,记者走进区看守所,听监管民警讲述高墙内发生的那些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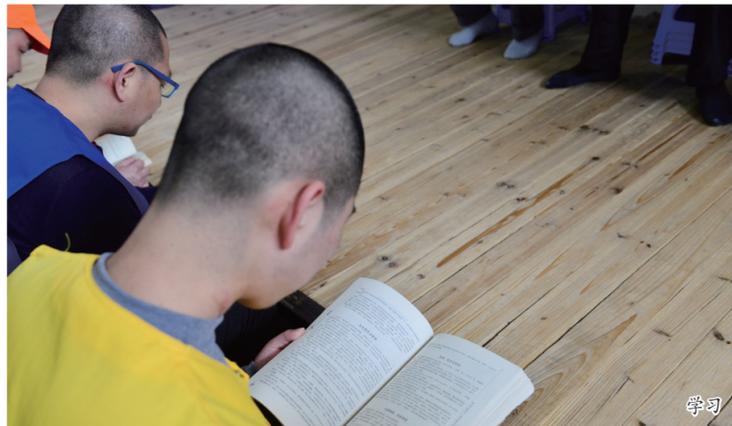


队列训练

8月16日上午9时,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0多度,但在区看守所门口,给人的感觉并无多热,反而生出一种望而生畏的肃穆感。从区看守所门口进去有一条不长的林荫道,树下徘徊着许多年龄不等的市民,或安静或焦躁。人虽多,却一点不嘈杂,他们都在等着去会见被羁押在看守所判决生效的亲人朋友。

有人进去,有人出来,在探视大厅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等着。会见窗前,外界的人透过玻璃窗和对讲机,向里面的人讲述着感情,匆匆几言又依依不舍。“阿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天热了睡不着,又中了点暑气,不然今天就一起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手里拎了一个袋子,嘴里念着些碎话,玻璃窗另一边是个面容肌瘦的中年人,只是简单回一句“叫阿妈自己当心点身体”。没多久,他就消失在视线里,像这样的场景,一天能看到数十次。

每周二至周四的9时至11时,下午的2时至4时是会见时间,但是按规定一个月只能会见一至二次,家人通常会带一些生活用品,寒暄数语后又安静离去。过了十时,来探视的人逐渐少了起来,大厅渐趋冷清。



学习



进监教育



谈话

特殊的“园丁”

看守所的民警虽被大家统称为监管民警,但其实被分为管教民警、内勤民警、巡控民警、医务民警和收押民警等,负责不同工作内容,各司其职。陈凯波是看守所的一名管教民警,从警已经近10年,现主要负责监室里在押人员的放风、进监教育、日常谈话、日常生活管理等工作。

每天上午9时,陈凯波一如往常把自己负责的三个监室里的在押人员带至监室外的一块空地放风。“那片空地是个极小的方正之地,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铁栏,这也是他们唯一能活动的地方。以前的劳动都取消了,如今改成了学习、法制教育。”陈凯波告诉记者,放风活动一般一个小时,放风结束后在押人员又会重新回到监室,这个小时对他们却是难得的放松时间。放风结束后,管教民警们会对犯人进监教育和日常谈话,了解他们的心理、

情绪健康等。

在看守所里,陈凯波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在押人员,盗窃的、诈骗的、抢劫的等等……包括死刑犯。“别看工作的内容听起来简单,但是了解在押人员的想法与沟通对管理工作开展很重要”。陈凯波说,监室里经常会遇到几个不服管教的刺头,情绪容易起伏偏激,争吵打架、寻衅滋事挺让人头疼的。

在他印象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难管对象,曾经有过一个被判了死缓的犯人许某,转到了陈凯波主管的监室,他常常跟人打架、出言顶撞、不服管教,给自己的管理工作带来各种麻烦。“很多在押人员的性格跟他们的成长和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他们在生活中比较缺少温暖和关心。跟他们多沟通交流往往比强硬的管教手段要有效得多。”陈凯波告诉记者,自己经常找他

们谈话,耐心地劝导沟通,一开始这些在押人员或许并不愿意多说,但久而久之,他们会渐渐放下戒备,也愿意与管教民警沟通。

后来,陈凯波在聊天中得知,许某早年离异,只有儿子一个亲人,十分在意,但自从他开始服刑后,儿子就与他断了联系。当别人都有亲人来会见,许某却始终不见他的儿子,这让他的性格异常暴躁。陈凯波得知此事后,一边与许某继续沟通交流,一边与同事们一起想办法寻找许某的儿子,最后终于不负所望。在许某收到儿子寄来的第一封信后,激动得难以言表,不禁落泪。自那以后,许某就很少再惹事吵架,性格较以往平和很多。

陈凯波看着内心满是感慨,类似许某的事并不在少数。今年7月,有一个刚被交付执行的死刑犯胡某,半年前转到陈凯波负责的监室里服刑。“胡某今年20多岁,

正是年少气盛的年纪,在监室里没少惹事,一遇到点事情就特别激动。”陈凯波说,自己一直尝试与他交流,让他看书,试图稳定胡某的情绪,但他一直都很抗拒。后来从每次日常谈话中了解到,胡某自小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他们感情深厚,他进看守所后,担心无人照顾他们,内心焦躁。了解这个情况后,陈凯波每次都会跟胡某聊一些关于他爷爷奶奶的话题,慢慢地他也愿意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在和胡某沟通后,他至少愿意静下心来看看书,以前是怎么都不愿意的,这也算是一种改变。”陈凯波说。其实,监狱与看守所对罪犯进行改造,除了法律赋予的威严,更多的是利用亲情和社会力量,驱使他们认罪伏法反思做人。比如家庭,家往往是大部分人最后的底线,也是心底最容易触动的地方,通过家人、亲情这些温暖的事,去感化他们。

穿着警服的医生

医生与警察,听起来两个毫不相关的职业,但是在副所长孙育书身上就很好地结合成了一体。他戏称自己是“穿着警服的医生”,既是警察也是医生。

孙育书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名医生,在基层卫生院工作了近10年。但在2002年时,通过考试意外成了一名警察,就这样被调到看守所成了一名“狱医”,身兼警察与医生,至今已16年。

同样救死扶伤,但在医院治病与在看守所治病有着天壤之别。“普通人生病,会客观地把病症告诉医生,不用担心作假撒谎,但在看守所不一样,很多犯人为了博得同情心或关注,撒谎是常有的事。”孙育书说,除了治病,做出精准的诊断、辨别对方是否撒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项不简单的工作。因为太多“狼来了”的事,反而会影响他们对真正病情的判断。

今年2月,有一个在押人员从上午6时左右就喊着腰背疼痛,但是并无病史。医院做了各项体检后并无发现有何异常,便怀疑其有故意装病的嫌疑,随后其被送回监室继续观察。当天正值周日,孙育书本是休息日子,恰好无事来看看守所转转。

孙育书一看到该在押人员的脸色就断定不是装病,立即询问了其检查情况,但在各个检查指标内发现没有血糖的数据,孙育书便立即让人给他做了血糖检测,结果发现各组数据都异常,最后确认为酮症酸中毒,便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送至医院抢救。“从在押人员感觉难受到发病仅仅2个小时,如果再晚一步就会危及生命。”孙育书说,最后经过及时抢救该在押人员脱离了生命危险,他的家属还特意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在看守所里治病救人的压力并不小,除了要同疾病抗争还要学会和在押人员周旋,像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判断

失误就容易酿成大错。”

在看守所,一共只有4个医务民警,但是面对的是数百个人的身心健康。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安排、巡诊,24小时的值班,还有一些固定吃药的人需要每天为他们开药。人才的紧缺和庞大的工作量,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工作日与节假日,对他们来说,一年365日日日相同。

孙育书说,去年是自己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年假,为了陪女儿去旅游一趟。但是即便在休年假时,也有各种工作上的电话打进来,对于他,工作和生活早就已经密不可分。“有时候生活和性格会被工作影响,把情绪带到家里,但很庆幸的是我的家人都很理解我。”说起家庭,孙育书轻轻一笑。

但16年的从警就医经历,也让孙育书遇见过许多不可思议、啼笑皆非的事,甚至

有人为了躲避判刑装疯卖傻。孙育书告诉记者,之前有过一个盗窃的惯犯,被抓进过七八次,也曾其他多个监狱服刑过,他利用装疯卖傻在其他地区骗取了取保的资格。最后辗转至区看守所,仍然继续装成精神病。“他一直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周多。如果一周不喝水,人会严重脱水,但这个犯人的症状不明显。”孙育书说,为了找出原因,自己只能对着监控一刻不停地连续观察了6天,最后发现,这名犯人虽然白天不吃不喝,但在洗澡时会偷偷喝水,这也证明他其实并没有精神疾病,最后被顺利判刑。

诸如此类的事件,孙育书遇到的还有很多。在看守所里,他们见惯了各种人性故事,穷凶极恶的、忏悔流泪的,但最后都只有一个共同目的:让在押人员看到希望,刺激他们朝好的方向努力。高墙内少一个故事,社会或许就会多一份和谐。

记者手记

感化失重的灵魂

从最外围进入关押的监区,共有7扇铁门,这一层层铁门,关住的是罪恶与黑暗。在监室的上方,巡控民警不停地巡查着情况,监室里的犯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囚服,具体根据情况的不同,服装会有颜色的区别。

在管教民警进监教育时,所有的模式都是军事化管理,声音洪亮、一丝不苟,讲授着法治教育与故事。监管民警这份职业对外界来说还是太过陌生,很多人也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其实他们不仅仅只是看住管住,更希望里面的人能明白法律与道德的束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看守所里有八个课程:时事政治课、传统文化课、学习交流课、现身说法课、心理辅导课、读书阅读课等……相比以前的劳动改造,现在更多的是文化、法律、身心等多方面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在押人员反思过去、认清犯罪危害、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看守所的民警则是他们的守护者、领路员与指导员。他们改造转化扭曲的灵魂,守护着社会的安宁、百姓的幸福,用无怨无悔的追求,谱写了一曲监狱人民警察的忠诚卫士之歌。